

# 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 边疆研究与中华民族整体性探索

汪洪亮

[提要]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民族研究,是抗战时期方兴未艾的中国人类学与边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学者在应对国家民族构建和边疆开发建设中所作的学术努力。华西坝学人对开发建设边疆及促进边疆社会文化建设提出的系列建议,贯穿了对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及增强抗战力量的关切。他们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识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思考,是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思想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也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思考同频共振。

[关键词] 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边疆研究;中华民族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11—0087—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清季民国时期羌地汉人社会生活与族群互动研究”(17YJC850017)、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中国藏羌彝民族地区汉人社会生活研究”(SC18EZD04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汪洪亮,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边疆学术史。四川 成都 610068

“华西坝”地处成都城南,因华西协合大学在此办学而得名。因抗战军兴,国民政府及大量高校、科研机构内迁,西南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及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中心。抗战时期多数教会大学也加入了西迁的行列。华西协合大学和应邀莅临华西坝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在当时即合称“华西五大学”或“华西联合大学”<sup>[1](P.43-45)</sup>,因五校均为教会大学,故笔者称其为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五校学者积极从事边疆民族研究,创办研究机构和刊物,发表调查报告和论著,在那个时期边疆研究学者群体中罕有其俦,为推动中华民族整体性构建做出了学术和理论贡献。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这段学术史做一个追溯,并对其边疆民族研究学术成绩及其学术关怀略作梳理。<sup>①</sup>

## 一、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联合办学及其边疆民族研究

为了整合办学资源,华西大学尽力缩减本校师生用房,采取共用、租借、挪用、新建等方法,共享教学设施,为兄弟学校提供了尽可能的协助。为统筹校际管理,五校采取联席会议制,包括校长联席会议及教务长、注册主任、训导长等联席会

议,会商各类事务。<sup>[2](P.140)</sup>五校实施校际自由选课,相互承认学分,实行师资互聘。在学术研究方面,五校联合举办学术讲座,创办研究机构,合办学术刊物,合作实验研究。五校同为基督教会大学,共同谱写了抗战大后方联合办学的篇章。

这个办学联合体群聚之前已有部分高校较早开展边疆民族研究。华西大学在教会大学中可能是最早投入边疆民族研究的,早在1919年就建成了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博物馆,开展了大量考古学民族学研究工作;1922年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聚焦中国西部边疆民族研究,多次组织赴川西北岷江流域和康藏区域考察;1924年创办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抗战前该校已经形成一支学科分布较为全面、中外学者参与的边疆民族研究群体。<sup>[3]</sup>燕京大学1934年筹备禹贡学会并发表《禹贡》半月刊,初以研究地理沿革、历史地理为旨趣,后转向边疆民族研究,自第4卷起出版多种边疆研究专号,并出版了多种边疆丛书。该校社会学系早期注重宗教服务、社会工作和社会调查,积极引进功能学派,推行社区调查,大力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研究视域主要是在城市或农村社区,对边疆民族研究并无关注。<sup>[4](P.42-46)</sup>金陵大学1933年聘徐益棠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及边疆问题讲座

教授,并“连合历史系政治系等教授共同推进研究”<sup>[5]</sup>,不少师生调整研究方向,参与边疆民族研究。齐鲁大学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力量,“特别注重乡村及市镇之服务人才的训练”<sup>[6]</sup>,但在边疆研究方面积累较少,如校长刘世传所言:“边疆问题,本校过去亦曾注意,但以地域所限,未能积极工作”。<sup>②</sup>金陵女子大学重视社会学系、医护预科及家政系等系科的建设与发展,没有开设边疆民族方面课程。<sup>[7](P.72-73)</sup>综上所述,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中,边疆民族研究学术传统有别,力量并不均衡。其中华西大学、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边疆民族研究开展较早,且各有其特色,其他两校则无积累。但是不管此前边疆研究历史长短,积累深浅,在联合办学期间,五大学边疆民族研究均得到极大推进,且保持密切互动,在社会服务方面也取得显著成绩。<sup>[8](P.160-168)</sup>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在边疆研究方面既有各自优势与特色,也有合作与协商。有些抗战之前即参与边疆研究的机构和刊物未能持续,如燕京大学的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但是从整体上看参与边疆研究的学者和新增边疆研究机构都更多了。这些机构有两种,一种是各校自己创建的,一种是五校合作甚至联合大后方学界共同建立的。前者如华西边疆研究所、金陵大学边疆社会研究室,后者如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中国边疆学会等。

华西大学博物馆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自1920年代起就着力于边疆民族研究,社会学系和华西边疆研究所可谓后起之秀。1930年代华西大学博物馆在美国传教士葛维汉锐意经营下已成为中国最好的高校博物馆。1941年中国学者郑德坤接任馆长,注重边疆考古与民族研究,对藏区文物搜集尤其尽力。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抗战时期队伍壮大,齐鲁大学侯宝璋、张奎,金陵大学李小缘、徐益棠、芳威廉,金陵女大刘恩兰,燕京大学林耀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方桂、吴金鼎加入学会,“不仅积极推进了华西研究,而且对学会极大的兴趣与关心”。<sup>[9](P.222)</sup>有些中国籍学者甚至担任会长一职,如方叔轩(1939-1940)、侯宝璋(1942-1943)、李安宅(1943-1945)、刘承钊(1946-1947)和蓝天鹤(1948-1949)。学会开展边疆实地研究,举办边疆文物展览,出版边疆研究成果,受到中外学界关注。<sup>[3](P.61-70)</sup>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杂志》从1940年起到1946年,每卷分A、B两编出版,分别是人文社科版和自然科学版。马长寿认为该学会在当时众多边疆研究团体中“工作最为努力”,所办杂志“最具历史性”<sup>[10](P.2-3)</sup>。徐益棠认为学会发展较快,办刊“内容亦日见精采,国际间亦渐有其相当的地位”<sup>[11](P.54)</sup>。社会学系最初开课侧重宗教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及医院社会工作等。李安宅1941年出任系主任后,在“社会学”下开设藏人历史地理和边疆政策两门课程,在社会行政组必修科目中设置了边疆民族问题、边疆教育、边疆社会工作、边疆行政等课程。<sup>[12](P.13)</sup>李安宅认为,“委托靠近边地或于边疆研究较有历史的大学,开辟乡村研习站,就近训练”,是“候补边疆工作人员有效训练”,特在成都老南门外石羊场建立社会研习站。<sup>[13](P.54)</sup>1942年李安宅创立了华西边疆研究所,主要研究人员有任乃强、于式玉、刘立千、郑象铎等,多为藏学专家。系所之间通力合作,在川甘地区数次调研,形成边疆民族调查报告多种。

抗战时期金陵大学成立了边疆社会研究室,以“中国边疆民族文化与边疆社会问题为研究范围”,工作内容包括室内研究、实地研究、“出版及学术宣传工作”及边疆社会文化工作设计与实验。<sup>[14](P.11-12)</sup>金陵大学注重实地调查研究,尤以康藏民族地区为主要调研区域。1938年夏,柯象峰、徐益棠率领西康社会考察团,到康定及周边考察藏族社会,是为“我国学术团体赴康之第一次工作”<sup>[15]</sup>。1940年暑假,柯象峰、徐益棠率四川省边区施教团20余人深入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调查当地经济社会,汇编成《雷马屏峨记略》。<sup>③</sup>金陵大学还创办了《边疆研究通讯》《边疆研究论丛》。《通讯》由卫惠林负责,重在沟通信息,立意在普及。凌纯声称赞《通讯》“吉光片羽,尤为脍炙人口”。<sup>[16]</sup>《论丛》由徐益棠编辑,“专刊本校师生关于我国边疆特殊问题研究之著作”<sup>[17]</sup>,重在精深研究,立意在提高。徐益棠凭借当时实际主持中国民族学会工作的机缘,以学会名义接办《西南边疆》杂志。

金陵女大系科设置相对简单,只有文理科。或因该校属女校,金陵女大关注较多的是文史之学与都市社会;社会学系关注社会行政及人口问题。该校没有成立边疆民族研究机构,但仅凭地理学教授刘恩兰的个人成就,在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边疆民族研究中,就已不再缺席。刘恩兰是中

国第一位环球考察北美及欧亚社会地理和风土人情的女地理学家,在金陵女大和华西大学讲授地理、地质和农业气象等课程。<sup>④</sup>刘恩兰注重野外考察,先后带领学生考察川西北自然与人文地理,其间历经艰险,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在《地理学报》发表了《四川理番高地四土之社会经济》《川西之高山聚落》,在《边政公论》发表了《理番四土之政治》《理番土壤概述》《理番之开发问题》;在《新中华》发表《四川西北边区民族之检讨》等重要论文。其考察点主要是川西北,关注领域重心在于地理,但也关涉人文与政治。她勤于发表藏羌地区考察日记,其边疆民族研究实绩与当时华西坝上其他学者相比,毫不逊色。

抗战时期,禹贡学会工作停止。顾颉刚远走西北、西南。燕京大学边疆民族研究传统的这一支已经中断;而社会学系开始在边疆民族研究领域发挥其社区研究的学术优势,1942年西迁成都之后增设了“西南边疆”“边疆语言”“边疆民族”等课程。社会学系初由李安宅兼理系务,1943年由林耀华接任系主任。在他们带动下,该系师生深入边地考察,如林耀华带队深入大小凉山彝区、康北及川西北藏区进行考察,李安宅深入西康德格社区考察藏民宗教语言等。<sup>⑤</sup>

抗战时期齐鲁大学的边疆民族研究别具特色,国学研究所和办事机构设置齐鲁大学的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成绩均甚可观。在顾颉刚、钱穆、张维华等人努力下,国学研究所重视搜集与整理边地史料,筹备编纂《中国民族史料集》《中国边陲史料丛书》<sup>[18](P.7)</sup>;倡导实地考察,黄和绳、江应樑、杨向奎、李文实等发表有基于实地考察的论著。顾颉刚约集五大学相关学人发起中国边疆学会,因当时分别在榆林、成都和重庆有三个同名的中国边疆学会,后来三会合一,总会设重庆,其他为分会。顾颉刚、姜蕴刚、张伯怀、柯象峰、韩儒林等华西坝教会五大学教授均为中国边疆学会理事。边疆服务运动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的服务边疆地区的社会服务活动。边疆服务部历届负责人都是齐鲁大学教师,在边疆服务运动的人员组配、制度安排中,齐鲁大学都发挥了主导性作用。边疆服务部负责具体筹划与组织,在川康民族地区积极开展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生计改良和边疆研究等工作。<sup>[19][20]</sup>那个时代国人心目中,很多不在国家边界但非汉族群集中

的地方也被看作是“边疆”,川康民族地区即属此类。<sup>[21]</sup>五大学中有四所大学校长名列边疆服务委员会(燕京大学1942年才迁来华西坝,也参与了边疆服务工作),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是边疆服务委员会主任;边疆服务的不少重要工作部类均由五大学教授领衔或承担,就连边部组织的暑期服务团,其主力也是五校学生。不少教授在边疆服务运动兴起及发展过程中充当了发起人、领导者和参与者的角色,积极参与边疆服务部组织的实地服务和调查研究。其边疆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直接服务于边疆服务的应用性研究,二是学者根据自身专业和兴趣所做的基础研究。前者集中在医疗和卫生方面,后者则包括边疆史地、语文、民俗、宗教等方面,在边疆史料及文物搜集、边疆论著编译、边疆文化、经济与社会研究等方面成绩卓著。<sup>[22]</sup>

## 二、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认识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整体观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众多边疆学者,到底如何表述边疆,如何建言边政?他们对中国边疆、边政的观察,是那时国人边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探索,也是那时国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学术努力。笔者拟对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相关学者关于边疆问题的若干论述略作梳理,具体分析他们对开发建设边疆及促进边疆民族社会文化建设的系列建议,体会时人对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性构筑及增强抗战力量的关切。

### (一)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边疆学者对中国边疆政策的检讨

边政问题不仅是个现实问题,也是个历史问题。有效处理边政问题,维护边疆地区稳定,是历代中央经略边疆的重要任务。历代边疆政策的实施及其成效,历代边政机构的设置及其作用,值得后人施行边政所借鉴。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边疆学者对传统中国的边疆政策进行了考察,发现其无为和放任之本质特点。顾颉刚认为中国过去的边疆政策,无非就是放任、分化两种。其中放任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王道,努力“修德”而使边民“不造反”;二是“舍弃边疆”,“那里出了乱子就把那里放弃”;三是“自然的同化”,他认为国人有种不论血统而论文化的观念,这种观念促成了各族融合,汉族是许多血统的混合结果,中华民族的发扬光大也成于这种同化的力量,不过“这只是一种

文化观念,并不能算做一种政策”。如果说顾颉刚对于所谓“放任”政策还有部分同情的话,那么对于分化政策,顾颉刚则给予了严厉批评。<sup>⑥</sup>徐益棠认为中国历代边疆政策主要就是“羁縻”,对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置之不问”,但在中央政府实力“衰替”之时,边疆多事,往往牵动大局,使国家从此不振,“鉴之历史,屡验不爽。及至今日,还逃不了这个例”。<sup>[23](P.3)</sup>李安宅认为中国对待边疆的传统做法之要点,一是“歧视边民,成见太深,未将边民看作国民”,二是“忽视边民生计,不论重威、重德,或德威并重、军政参用,以及利用羁縻、教导诸法,均未改善边民生计。换言之,过去边疆“所谓政治,也限于管与教,而未顾及养与卫;更不用说,即管也未彻底,而教只在形式”。<sup>[13](P.21-22)</sup>

历代中央边疆政策基本上都是无为而治,近代中国依然如是,就是到了抗战前夕,国民政府的边政也难说是积极进取的。徐益棠注意到,国民党及其政府虽对边疆民族多次表示密切注意,“然迄未规定具体的边疆政策设施纲领,故数年来关于边疆的行政机构常有‘无所适从’之感。”<sup>[11](P.52-59)</sup>这一观察在当时不乏知音。1937年,思慕陈述了中国严峻的边疆问题,试图回答“究竟中国政府对边疆是不是有政策,是甚么政策,执行的效果怎样”<sup>[24](P.3-4)</sup>。边疆政策之有无尚且存疑,最能证明国民政府边政成效甚微。国民党及政府在其施政纲领中虽有民族政策的明确表述,但对边疆问题却表述模糊。边疆政策的核心是民族问题,但二者不能等同。那时一直有学者呼吁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或者“向政府要边疆政策”。这并非学者对政府政策吹毛求疵、熟视无睹。周昆田就承认,历届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体会议对边疆问题虽均有涉及,但“有关此项文献,前后散列,易为一般人所忽视,或竟以为现在尚无一定之边疆政策”<sup>[25](P.5)</sup>。

## (二) 华西坝边疆学人对边疆治理及开发的主张

抗战时期,由于东部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把西部地区视作抗战建国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把开发建设边疆作为抗战能够持续进行的重要基础。<sup>[26](P.23-30)</sup>华西坝学人关注中国边疆大势,深知边疆多事,与列强环伺从中搅动有关,也认识到中国边政必须全面筹谋。徐益棠就说,中国边疆问题“从前还是内部的问题,现在却有国际的背景;从前的问题简单,现在的问题复杂;从前可以用一种空虚的怀柔政策来羁縻,他们现在却须有

实利的获得;从前只须有武力可以平靖,现在却除了武力以外,还须有其他的积极的建设——政治、经济、宗教、教育……”<sup>[23](P.3)</sup>卫惠林1943年指出:“‘边疆建设’这口号在最近二三年来由朝野一致的要求与抗战建国的实际需要,已由言论进于行动,由主张变为政府的决策了,自八中全会以来,每次党的政府的民意机关的重要决策,总有关于边疆建设的若干决议,若干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措施,已见诸施行。但边疆还是边疆,一些临时的设施距离时代与国家的要求仍甚遥远。世界改造与国家建设的趋势愈紧迫,对边疆的期望愈深切。”<sup>[27](P.8)</sup>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曾两度提出要完成国家建设就要推行“五大建设”。1938年他提出了要搞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武力建设,分别形成精神力量、物质力量、社会力量、政治力和武力等五大力量,五大力量的总和就是国力,其中以武力为基础,故五大建设应以武力建设为中心。<sup>[28](P.2)</sup>这番表态发表时,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决胜因素当然主要取决于武力。1944年中日战争已经形成了有利于中国的转向,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所提到的“五大建设”变成了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武力建设不在其中,可见时局变化之下国家建设的重心转移。边疆建设“五大建设”当然指后者。在李安宅看来,五大建设可以归结为工具之学和人本之学:“经济建设即工具之学之实现,其它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等建设,归根结底,若以工具之学与人本之学相提并论,均可归纳于上述社会建设之中。”<sup>[29](P.69)</sup>为了便于讨论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关于边疆边政问题的认识,我们借用李安宅所言“工具之学”与“人本之学”来讨论这个问题。

作为“工具之学”的边疆经济建设是个系统工程,绝非单方面某项工作即可竣事,需要统筹规划,逐步落实。边疆开发,主要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徐益棠认为政府对边疆经济建设既须有“极大的努力”,也要有“极久之耐心”。他强调开发边疆经济,“第一,当为国家着想,第二,当为边区人士着想”:一是“不与边民争利”,“不能随意移垦民于牧场,造森林于耕地,即开发荒地荒山,亦必须判明其有无某民族或某部落之习惯的土地权;如政府必须收用此种荒地荒山,亦必须觅一相

当的土地以为交换,或仍袭用彼等遗传之租佃的习惯法”,二是“从最接近于边民之利益做起——科学方法与科学知识”,三是“诚意扶植良好的经济组织,努力铲除现代化之资本主义”,四是“尽量训练土人”,“不能专养成依赖中央或地方政府之扶助”,五是“机构有系统而直接,赋税须合理而单一。”<sup>[30](P.1-2)</sup>

边疆地区地广人稀,除东北农业区外,人口密度极低。任乃强认为“亟待移民垦殖”,“所有一切边疆新事业,皆以垦场为出发点”,“以具有固定性之垦场为边疆社会工作基点”,“以垦场容纳内腹地移殖之边疆社会工作人员”。<sup>[31](P.55)</sup>徐益棠提醒移民垦殖应因地制宜:“因为土地、天气,以及一切农作方法之不同,当然会发生许多应考虑的问题;西北因土性地形的关系,容纳人口的量,远不及东北”。<sup>[23](P.4-5)</sup>郑象铎认为移民实边应首先解决移民生活问题,一是“移入人口须饬令携带家眷,以资永久”;二是“移入居民须身强力强,并为富有进取心之青年”;三是“移入人口须自成村落,暂不与土著混居”,以免过快被“同化”;四是移民应分配较多土地以维持生计。<sup>[32](P.41-50)</sup>其中第一和第三点,皆为其他人较少提及者,颇有警示价值。对于边地汉人在边疆建设中发挥的作用,陶云逵和李安宅提出了两种向度的思考。陶云逵认为边地汉人是边疆建设中“一把便利的钥匙”,可以作为“实际工作者与边胞间”的“枢纽人”<sup>[33](P.28-34)</sup>;但李安宅也提醒,有些边地汉人不仅不能开发边疆,反被边疆所开发,只会习得边民坏处并向边疆传播内地的劣点,成为内地文化和边疆文化这两种文化的“限界群”。<sup>[34](P.10)</sup>这两种向度的思考,只有辩证地统一起来看,才能比较客观地评估边地汉人在边疆建设中的作用。

顾颉刚认为边疆问题很大程度是由交通不便而发生的,当时内地人要到西藏、新疆、蒙古往往借道于外国,“因为内地与边疆的交通如此困难,所以彼此就不甚往来,彼此的关系就渐渐疏远”,“其实只要交通方便,风俗习惯就自会转变融合”。顾颉刚强调,“最重要的边疆问题只是一个交通问题!固然实业、教育等问题都很重要,但是交通问题没有得到一个相当的解决时,别的问题实在无从谈起”,“交通便利以后,工业、农业、商业都可以随着发展。”人的因素也是边疆开发的一个制约因素。顾颉刚提出要训练调查人才,“使他们具有调查的

各种技能,而又有恒心,才能做成有系统而又极确切的著作,才可有利于我们的国家。”<sup>[35](P.2-8)</sup>徐益棠特别强调“边官”问题,认为政府“当为边疆着想而训练官吏,保障官吏,鼓励官吏,使边疆处处事得其才,才尽其用”。但过去政府没有将边疆问题纳入国民教育,没有“以从事边疆事业为终身志业”来训练官吏,没有以良好的保障与待遇来鼓励边疆工作者,在经费、人事等方面没有形成促进有志青年的推动力量。<sup>[36](P.1-3)</sup>此外边疆工作者也需提高边地工作意识和能力。李安宅提出边疆工作人员“第一要有适应于自然的体魄,第二要有适应于人群的态度,第三要有适应于工作本身的能力。”他认为:“如欲建设边疆,必得深入边疆;若要深入边疆,必在物质生活先能迁就边疆,化于边疆。化于边疆,方能适应于边疆”,在文化上,“适应于边民者更需要两点特别认识,第一即所谓部族问题,第二即所谓宗教问题。”<sup>[37](P.8-11)</sup>

### (三) 华西坝边疆学人对边疆社会文化建设的主张

人本之学的核心主要在民生与民族。徐益棠强调,“基于复兴民族的方案,自然千头万绪”,但“今后共同努力的目标”还是在“养民”、“教民”、“保民”三个方面:政府应该“施行养民之政,完成国民经济建设,以裕民生”;“加紧实施教民的工作,使全国民众深切认识中华民族过去失败的原因,目前危险的程度,而反省自振,决定改善的方针,以求解除过去所受之重重束缚”;还要抵御外侮,延续民族生存,“一方面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造成一般能忍受饥寒,不避艰辛的铁汉,以资捍卫国家,一方面尤须整饬武备,充实国防,俾能战胜侵略者,达到最后的成功。”<sup>⑦</sup>徐益棠所言,既涉及经济建设,也涉及心理建设。他呼吁使边疆民众“对于政府发生信仰,对国家竭诚爱护,使他们和国家发生不可分离的团结,知道个人不能离开了国家而独存”,希望边疆民众“总有一天会自动地觉悟起来,来拥护这个共存共荣的国家。”<sup>[23](P.6-7)</sup>

边疆建设之难,除了自然条件制约,更在于族群认知和文化认同弥合问题。李安宅提出,边疆建设主要就是社会建设,注重物质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是“舍本求末”。<sup>[29](P.69)</sup>边疆工作应取得边民信任和理解,“必先有事于‘社会工程’,即社会工作”,“发展生产技术,培植或利用天然富源,下手功夫均不在专门知识的运用,而在怎样被人接

受,怎样使人欢迎进步的表证……有了普遍的社会工作在边疆,才会创造出分工合作的沟通文化的基础,才会实现了生产建设与精神建设,而使一般法律一般政治树立得起来,推行得下去。”李安宅干脆下了一个更为斩钉截铁的结论:“边疆工作主要乃是社会工作”,“一切边疆工作,只要是建设性的,永久性的,均为社会建设的工作。”<sup>[13](P.23-26)</sup>

在笔者看来,社会建设中尤其重要者,即在于文化之沟通,族群之凝聚。边疆文化建设与边疆社会建设相辅相成。凌纯声认为国人注意“民族”是在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之后,边疆文化研究也“应运而发达”,“成就可述者”至少有两个,一是过去视为“无稽之谈”的“夷汉同源论”现今有了“科学的根据”;二是过去认为日渐衰老的“中华民族”,现今被乐观地认为因各族融合而造成“日在生长,历久而未曾衰老”。<sup>[38](P.62)</sup>“夷汉同源”论确有不少拥护者,就是国民政府也在极力倡导此种理论。<sup>[39](P.56-62)</sup>但也有相当多的不同看法,如顾颉刚就认为中华民族并非同源,而是在长期融合中汇流而成。<sup>[40](P.42-49)</sup>在徐益棠看来,解决民族问题不在于鼓励各民族独立发展,而在于各民族融合而成为整个国族,树立统一的国家观念,政府应放弃羁縻政策,“制定一贯永久的计划,不仅顾及物质的建设,更注意于心理的建设”。<sup>[23](P.5-6)</sup>他还提出了边疆治理中文化重于政治,“无文化之政治,其基础亦不稳固”,“政治虽与文化并重,然文化宜先于政治,盖政治易而文化工作难”。<sup>[41](P.16-17)</sup>他认为“中国边区民族与汉族同为震旦语系,与汉族同为蒙古利亚种,从较宽泛之范围言,其语言体质已有相同之根基”,只是在物质文化上有些微差异,于整体而言无伤大雅。他提醒,以物质文化为标准进行民族分类是不科学的,因为文化性质易于传播,极不稳定,而且民族对文化复有独立创造之能力,人类心理及所创造之文化,大率类同。他注意到欧洲不少学者主张从体质上对一国民族进行划分,因划分过于严格,使得各民族不容易团结,认为日本利用汉、满不同名称,分化我国民族团结心理,故“最不赞成民族从体质方面去分,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sup>[42](P.14)</sup>话至此,其意甚明。徐益棠这一番表态,遥遥呼应了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显然是力挺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论断。<sup>[43](64-72)</sup>

对边疆民族多元文化的准确认识是边疆工作的重要基础。吴文藻强调边疆开发的目标是要实

现边疆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须对边疆文化因势利导,“使之与中原文化混合为一,完成一个中华民族文化,造成一个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国家”。<sup>[44](P.11)</sup>在一篇专门论述边疆教育的文章中,吴文藻指出,“欲铲除各民族间互相猜忌的心理,而融洽其向来隔阂的感情,亟须在根本上,扶植边地人民。改善边民生活,启发边民智识,阐明‘中华民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要旨,晓示‘中华民族完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真义。能如是,则思想可以统一,组织可以健全,畛域可以化除,团结可以实现,国力既充,边圉自固。惟欲团结各民族精神,使‘多元文化’,冶于一炉,成为‘政治一体’,当自沟通各民族文化始。而欲沟通各民族文化,必先发扬中国的民族文化及时代精神,造成一个中心势力;有了中心势力,就可消极的防止离心运动,积极的促成向心运动。”<sup>[45](P.150-151)</sup>后来费孝通表达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吴文藻这篇文章里已经呼之欲出。吴文藻强调中国边疆的特殊性,“对中央不是殖民地的关系,不是藩属的关系,亦不是如欧美人或日本人所说保护国和宗主权的关系,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或一个中华民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所以中国边疆教育是“中国文化与土著文化双方并重同时并行的边地义务教育”。<sup>[45](P.150-151)</sup>

边疆教育是近代新型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政府层面对边疆教育往往较为生硬地要求强化国族建设,淡化边疆民族文化,但其统筹资源的能力不足,故其用意虽好,成效难彰。<sup>[46](P.227-237)</sup>徐益棠提出边疆教育的原则应该是“以民族特性为背景”,“以民族一员为始点,以国家一员为终点”。他认为“边民教育最大之困难,亦为边民教育最应注意之点”就是民族隔阂成见,边疆教育者应努力设法消除成见,“而为大中华民族唯一单元之团结。此种团结,当从‘公民’责任观念培植之,边民学校教师,当从各民族‘小单元’观念渐渐求其扩大,从各个人在其‘小单元’中的活动——忠实的服务精神,引诱其加入社会,为地方、为政府机关服务,如筑公路、看护病人、组织国民兵等。边疆教育最后之责任,为边民个人谋福利,为中华民国求团结”。<sup>[47](P.19-22)</sup>

### 三、结语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除了关注边疆建设和发展外,最为关注的就是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建构问题。他们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识及对中

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思考,是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思想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思考同频共振。尽管那时学界对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整体有着不同意见,但逐步有更多人倾向于认可其整体性。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虽然强调血缘、地域、语言等民族形成的客观因素的重要性,但都更看重“民族意识”这种主观因素在民族凝聚中的重要性。梁启超就认为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sup>[48](P.1)</sup>孙中山指出:“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义范围,则以意志为归者也。”<sup>[49](P.186-187)</sup>他们的这一思想得到更多后来者的追随。抗战时期,很少人强调民族血统因素,即使提及也是强化“同源”观点,希望各族树立中华民族意识。这种由强调血统的种族到呼唤民族精神文化的观念转变,在外患日亟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齐思和就充分肯定那时很多人的思想由“狭隘的种族主义进入了民族主义”,目标由“种族之间的倾轧转到了全民族的奋斗”是一个“大进步,大觉悟。”他认为形成民族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命运共同体”一员的情绪。<sup>[50](P.1-10)</sup>1937年初,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认为“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这个民族里的种族,他们的利害荣辱是一致的,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sup>[51]</sup>顾颉刚认为,“建国的先决条件”是要“团结国内各种各族,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sup>[52]</sup>他在回应费孝通的文中进一步重申语言、文化和体质都不是构成民族的条件,构成民族的主要条件只是一个“团结的情绪”。<sup>[53-54]</sup>与顾颉刚强调中华民族内部殊途同归不同,张廷休较早主张同始而不同终的“同源”论。但他也赞成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反对提倡“云南民族”,认为这是对“民族”的滥用。在他看来,“中国没有少数民族问题”,中国边疆地区“绝对没有什么民族问题,只有教育的问题”。<sup>⑧</sup>岑家梧认为,顾颉刚和张廷休的主张虽稍有不同,但都是同样地指出“中华民族的统一性”。这种民族统一性的努力实际上就是要建构中华民族这个国族。<sup>[55](P.1-2)</sup>那时学者不管是论述其久远的历史基因,还是讲述其现实基础,都是为了呼吁国内各族应该团结,证明中华民族具有整体性。

政学两界人士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强调,可以说是那时边疆民族研究的一个基本语境。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的学术努力,则在抗战时期已

有较为充分的体现。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在相当丰富的边疆民族研究实践中,同样贯穿了他们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论证及共同体构建的苦心孤诣。他们特别寄希望于做好边疆社会工作,搞好边疆教育和国民整体性塑造工作,就在于他们认识到,在抗战建国的时代主题下,唯有打破所谓种族、民族、部族等各类藩篱,将各个族群整合成一个具有“共同情绪”的团结的国族,才能将国民凝聚整合起来以实现整体性的组织方式,从而具备取得抗战胜利重建国家的必要条件。总之,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民族研究,是抗战时期方兴未艾的中国人类学与边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学者在应对国家民族构建和边疆开发建设中所作的学术努力。

#### 注释:

①学界已有针对抗战时期内迁的一些重要高校及相关学科专业的历史研究成果,但较少有边疆研究方面的专门论述。关于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成果虽多,但从高校角度切入的研究成果亦甚寥寥,仅有蒋正虎:《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学的边疆研究机构》(《烟台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马玉华:《西南联大与西南边疆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钟荣帆:《金陵大学的边疆研究述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等数篇。岱峻的《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和《弦诵复骊歌——教会大学学人往事》(商务印书馆2017年),梳理了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发展历程及部分学人与学科往事,但对其边疆研究着墨不多。故对此问题的探讨尚有较大空间。

②刘世传:《抗战以来的齐大》,1940年12月于齐鲁大学,参见《齐鲁大学概况及齐大教职员录(1939年度)》,山东省档案馆藏,案卷号:J109-1-302。

③《五年来之金陵大学文学院》,1943年4月,第13页。参见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3页。

④王静:《中国第一位女海洋学家——刘恩兰》,钱焕琦主编《金女大校友口述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22页;滕叙究:《大海的女儿——记海洋地理学家刘恩兰教授》,《名将名师:哈军工“两老”传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第38-55页。

⑤傅榛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社会》1982年第4期,第42-46页。按:傅文表述有些问题,吴文藻那时已在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和中国边政学会工作,但因其其在燕大的地位,对燕大社会学系还是有很大影响。李安宅从事拉卜楞调查则是在来到华西大学之前,当然此间他安排了黄明信驻寺考察。特此说明。

⑥顾颉刚:《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上)》,《西北通讯》1947年第3期,第1-3页。按:该文初为顾颉刚在抗战时期多地演讲之讲稿,后由李文实整理发表。

⑦徐益棠曾在《地理教育》《广播周报》及《蒙藏学校校刊》等不同刊物发表《边疆建设的根本问题》一文,本段有关“养民”“教民”“保民”的论述仅见于《蒙藏学校校刊》1937年第13期第2-3页,特此说明。

⑧参见张廷休:《苗夷汉同源论》,《中央周刊》1939年4月,第33期;《再论夷汉同源》,《西南边疆》第6期,1939年5月;《边疆教育与民族问题》,《学生之友》1941年第1期。在这些文章中,张廷休反复推广其同源论。也有人提倡汉藏同源论,见王光璧:《汉

藏同源论》,《康导月刊》第2卷第11期,1940年7月25日。

## 参考文献:

- [1] 巨蕾. 齐鲁大学在华西坝[J]. 学生之友,1941(4).
- [2] 王光媛. 抗战时期的华西协合大学[J].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9). 成都:成都出版社,1985.
- [3] 周蜀蓉. 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会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18.
- [4] 傅榛冬.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J]. 社会,1982(4).
- [5] 金陵大学文学院自二十三年度起至现在工作述要[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649-1626.
- [6] 罗登修. 齐鲁大学与乡村教育[J].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29(3).
- [7] 程斯辉,孙海英. 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 [8] 汪洪亮. 殊途同归: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学术传统[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9(1).
- [9] Secretary Writing,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1. 6. B, (1946): 222.
- [10] 马长寿. 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边疆通讯,1947(4).
- [11] 徐益棠. 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J]. 边政公论,1942(5-6).
- [12] 高伦举. 社会学系[J]. 华大校刊,1949年4月30日文学院特刊.
- [13] 李安宅. 边疆社会工作[M]. 上海:中华书局,1944.
- [14] 金陵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边疆研究室工作计划大纲草案[J]. 边疆研究通讯,1942(1).
- [15] 柯象峰. 西康纪行[J]. 边政公论,1941(3-4).
- [16] 私立金陵大学关于讲习、补助、各科研究经费与教育部的来往文书(内有英文)(1935.9-1947.11)[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649-250.
- [17] 边疆研究论丛稿约[J]. 边疆研究论丛,1941,封底.
- [18] 齐鲁大学重建国学研究所[J]. 读书通讯,1940(9).
- [19] 汪洪亮.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运动研究[D]. 四川师范大学,2004.
- [20] 杨天宏. 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M]. 北京:三联书店,2010.
- [21] 汪洪亮. 民国时期国人对“边疆”、“边政”含义的认识[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1).
- [22] 汪洪亮. 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与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2).
- [23] 徐益棠. 边疆建设的根本问题[J]. 地理教育,1937(3).
- [24] 思慕. 中国边疆问题讲话[M]. 上海:生活书店,1937.
- [25] 周昆田. 三民主义之边政建设[J]. 边政公论,1941(1).
- [26] 汪洪亮. 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27] 卫惠林. 边疆文化建设区站制度拟议[J]. 边政公论,1943(1-2).
- [28] 蒋中正. 五大建设[J]. 中央周刊,1938(17).
- [29] 李安宅. 边疆社会建设[J]. 社会建设,1944(1).
- [30] 徐益棠. 边疆经济之相对的发展[J]. 边政公论,1944(6).
- [31] 任乃强. 边疆垦殖与社会工作(中)[J]. 社会建设,1944(2).
- [32] 郑家铎. 西康高原区之农业与移殖[J]. 边政公论,1943(11-12).
- [33] 陶云逵. 论边地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之关系[J]. 边政公论,1943(1-2).
- [34] 李安宅. 论边疆社会工作所有之困难与吸力[J]. 康导月刊,1943(9).
- [35] 顾颉刚. 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下)[J]. 西北通讯,1947(4).
- [36] 徐益棠. 边官边民与边政[J]. 边政公论,1948(1).
- [37] 李安宅. 边疆工作所需的条件[J]. 文化先锋,1944(4).
- [38] 凌纯声. 中国边疆文化(下)[J]. 边政公论,1942(11-12).
- [39] 汪洪亮. 国族建构语境下国人对边疆地区多元文化及教育方略的认识——侧重20世纪30-40年代的西南地区[J]. 四川大学学报,2011(4).
- [40] 汪洪亮. 顾颉刚与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J]. 齐鲁学刊,2003(1).
- [41] 徐益棠. 雷波小凉山伊族调查[J]. 西南边疆,1941(13).
- [42] 徐益棠. 民族学大纲[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
- [43] 汪洪亮,钟荣帆. 文化先行与边民为本:徐益棠边政思想述论[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9(4).
- [44] 吴文藻. 边政学发凡[J]. 边政公论,1942(5-6).
- [45] 吴文藻. 论边疆教育[J]. 益世周报,1938(10).
- [46] 刘波儿. 构建国族国家:民国时期民族学家的边疆教育实践[J].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15(29).
- [47] 徐益棠. 边疆教育的几个原则[J]. 学思,1942(3).
- [48] 梁启超.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A]//饮室合集(专集42)[C].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49] 孙中山. 三民主义[A]//孙中山全集(第5卷)[C].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50] 齐思和. 民族与种族[J]. 禹贡半月刊,1937(1-3).
- [51] 顾颉刚. 中华民族的团结[N]. 申报. 星期论坛,1937-01-10.
- [52]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N]. 益世报·边疆周刊(9),1939-02-13.
- [53] 顾颉刚. 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N]. 益世报,1939-05-08.
- [54] 顾颉刚. 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N]. 益世报,1939-05-29.
- [55] 岑家梧. 论民族与宗族[J]. 边政公论,1944(4).

收稿日期 2019-08-25 责任编辑 杨春蓉